

# 略论古蜀文明的形态特征<sup>\*</sup>

赵殿增

〔摘要〕三星堆神权国家的形成发展和影响,可能是研究古蜀文明形态特征的关键所在。如果说与生态环境协调的经济生活——稻作文明、适应自然的文化传统——神话古史是前提条件,而以原始宗教维系的古国——神权国家,则是问题的核心。由此派生出古蜀文明另两个显著特征,即注重人物造型的艺术传统、多元文化的有机融汇的社会构成,进而在神权与王权的统一和矛盾之中,影响着古蜀历史的发展,并因其人神相通的神仙观念,成为道教思想的重要源头。古蜀文明如此鲜明的形态特征,使其在统一的进程中成为汉民族根基之一,在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发展史上都有特定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古蜀文明;稻作文明;神话古史;神权;艺术

〔中图分类号〕K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05)04-0026-06

近几十年三星堆等大量考古发现表明,蜀地曾有一个特色鲜明的古代文明。它与中原等地的早期文明既有相似性,又有特殊性。从地域上看,古蜀文明主要分布于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西部,有时延伸到三峡内外、云贵高原、汉中等地。从时间上讲,古蜀文明大约从距今4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到2000年前的西汉初期,可分为宝墩文化(三星堆一期文化,距今约4800—4000年)、三星堆文化(三星堆遗址二、三期文化,距今约4000—3200年)、十二桥文化(金沙遗址等,距今约3200—2600年)、晚期巴蜀文化(约公元前600年左右至公元前316年)、与秦汉文化融合(约公元前316至公元前100年左右)等五个阶段<sup>〔1〕</sup>。在这广阔的时空框架里,古蜀人创造了独具特色、自成体系、源远流长的早期文明,最终汇入了华夏文明之中。正确认识古蜀文明的形态特征,有助于深入探讨它的价值及其在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拟对此作初步探讨。

## 一、与生态环境协调的经济生活——稻作文明

四川盆地是一个自然条件优越的内陆盆地,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这里气候温暖,雨水充足,四季常绿,加之资源丰富,物产繁荣,动物众多,“有璧玉、金、银……桑、漆、麻、纻之饶”<sup>〔2〕</sup>,自古就被誉为一方乐土。《山海经·海内经》载,“西南黑水、青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引者按:即成都平原),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地之中,素女所出也。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华实,草林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一派天国胜境。《史记·货殖列传》称“巴蜀亦沃野,地饶”。《华阳国志·蜀志》说这里“地称天府,原曰华阳”,“山林泽渔,园囿瓜果,四节代熟,靡不有焉”。

古蜀人在此经营多年,形成了一套与生态环境协调的经济生活方式。农作物有稻、麦、黍、稷、豆、芋;园艺有“四季瓜果”;牲畜有鸡、犬、猪、马、牛、羊;采集有药材、蕨、藻;狩猎有犀、象、熊、鹿<sup>〔3〕</sup>,形成以

<sup>\*</sup>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长江上游古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从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到金沙遗址”(批准号:04XKG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赵殿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四川 成都 610041。

水稻作物为主的稻作文明。我国的水稻种植大约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sup>[4]</sup>，在江西、浙江、湖南等地已发现了七八千年前乃至上万年的水稻标本。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宝墩文化（三星堆一期文化）受到长江中下游文化的强烈影响，水稻作物可能是这时传入的，并逐步形成典型的稻作文明。

从三星堆文化的经济情况看，经过上千年的长期定居，农业有了很大发展，使用着多种耕作工具，也有一定的防洪和灌溉技术（早期城墙沟濠多与防洪用水有关）。大量的酒器的发现，既反映了酿酒技术的发展，也表明有较多的粮食剩余。成堆的兽骨，表现出畜牧业的发展。宏大精美的青铜器群，规整细致的玉石礼器，反映了手工业、青铜铸造业等技术高度发达，冶炼、铸造、连接技术先进，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和很高的水平。从泥范和石器半成品看，制作的作坊就在遗址群内。制陶业继续进步，并形成自己一套造型特征和艺术风格。夯土、土坯砖、木构梁架的使用表明，建筑技术也达到很高的水平。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生产生活用品，众多的装饰品，礼器和祭祀用神器，证明当时已完成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从农业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行业。海贝、玉石璧琚的大量出现，反映了商品货币经济已经开始，财产和货币的占有逐步集中。器物群中多种文化因素和遥远的海洋产品的发现，说明贸易和交通也取得很大发展，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也已开始。绘画、雕塑、装饰和多种礼仪用品的发现，表现了三星堆时期美术、舞蹈、音乐等方面发展到一个高峰。这些出土文物反映当时人们对天象、地理、动物、植物乃至物理、天文、数学等方面有了相当水平的观察和认识，在利用和改造自然方面取得了不少科学技术成果<sup>[5]</sup>。

这种稻作文明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与自然生态环境的相协调，较好地利用了自然条件，又较少地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因而才有“百谷自生，冬夏播种。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华实，草林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的天府之况，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了灿烂的古蜀文明。

## 二、适应自然的文化传统——神话古史

古代蜀人没有留下自己的历史文献，他们的传说故事散见于汉晋前后的某些书籍之中，比较杂乱，而且多是以神话传说的形式出现。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古蜀文字尚未破译识读，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古蜀文明的神奇特色，具有一种适应自然与环境相协调的良好人文传统。

关于文献古籍中的蜀史传说，前辈学者已做过较好的整理<sup>[6]</sup>。传说蜀人在远古时期就与黄帝、颛顼等中原部落首领有关。《史记》云“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颛顼”，蜀山氏可能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蜀人首领之一。《蜀王本纪》云“蜀王之先名蚕丛、柏灌、鱼凫、蒲泽（杜宇）、开明”，“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曰柏灌，又次者曰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蜀记》云“上古时，蜀之君长治国久长，后皆仙去，自望帝（杜宇）以来，传授始密”。《华阳国志》云“开明氏凡王蜀十二世”。直到公元前316年蜀被秦所灭，蜀国已有自己数千年的发展史。

蜀史传说中一直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如蜀山氏只知其与“蜀山”有关。蚕丛氏蜀王以“纵目”为突出特征，着“青衣”为神，或曾教民养蚕。鱼凫“田于湔山，得仙”。《蜀王本纪》云“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杜宇氏“从天而下，自称望帝”，死后化为杜鹃。开明王鳖灵“死，其尸溯流而上，至汶山忽复生。杜宇神之，以为相”。此类故事还有很多。

这种以神话传说形式出现的历史，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蜀人具有与自然相适应的文化传统。他们的祖先可能来自山区，对大山有一种本能的依赖和崇拜，死后（失败后）也往往是“升西山隐焉”<sup>[7]</sup>。他们与大自然长期和睦相处，部落首领多以鸟兽为名，如柏灌、鱼凫、杜宇，可能都是鸟名或鱼鸟合名。他们从事采集、渔猎、稻作农业生产，因而在古史中留下了许多与动植物相互交融乃至互相转化的传说，反映出原始宗教信仰习俗与历史故事相互渗透的文化面貌。蜀人的历史正是在这种适应和尊重自然的传统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 三、以原始宗教维系的古国——神权国家

在3000至4000年前三星堆文化繁荣时期，三星堆已形成了一个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中心。从政治体制社会性质看，三星堆繁荣期反映出具有国家形式的政治实体已经形成。巨大的城区，面积仅次于同时期的郑州商城，居全国前列。城区有密集的建筑，有一组建筑面积达数百平方米，虽然还不能确定是宫殿，但它已超过一般居室的功能。祭祀坑多处发现，出土文物异常丰富，三星堆经常举行大型祭祀活动，祭天地祖先，以此表示主持者具有代表公众讲话的权威。出土的金杖上有带王冠的头像和鱼鸟图案，是国王的权杖，或许就是鱼凫王的标志。三星堆可能就是古蜀鱼凫王的都邑。私有财产的发

展,财富的集中,必然导致阶级的产生。兵器、礼器的出现,反映了政权的力量。三星堆遗址内曾发现两个反缚跪立的石象,是当时进入奴隶制社会的佐证之一。大量资料证明,三星堆遗址可能是早期蜀国的一座都城<sup>[8]</sup>。

这个早期文明的突出特征,就在于它可能是一个以原始宗教维系的古国——神权国家。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证明,这里是一个以宗教祭祀活动为主的古蜀文明中心。遗址中除了生活用品之外,还出土了大批祭神用的祭器和礼器,最有代表性的是1986年发掘的一号祭祀坑和二号祭祀坑。两坑共出土青铜器、玉器、金器、象牙等1800多件,包括立人像、大面具、青铜神树、金杖、祭山图玉璋等珍宝,反映出当时存在着以太阳、树崇拜为代表的自然崇拜;以鸟、鱼为突出表现的图腾崇拜;以“眼睛崇拜”形式表现出来的对“纵目神”蚕丛的祖先崇拜;并通过以雕像群体所表现的巫祭集团组织原始宗教活动,建成以神权为主体的早期国家,形成三星堆古国的一个重要特征<sup>[9]</sup>。古人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三星堆古国的祭祀器物丰富,而兵器极少,即使有玉戈、齿援铜戈等器物,也质地碎弱,未曾开刃,成为礼器和祭器。

除一号和二号祭祀坑外,三星堆遗址内外还发现过四五个埋藏玉石礼器的土坑,如月亮湾器物坑、仓包包祭祀坑、高骈乡器物坑、盐亭县麻秧乡器物坑等,我曾提出它们也应是祭祀坑,在1990年初的两篇文章中做过初步分析<sup>[10]</sup>。这种观点逐渐得到认同,并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佐证。如2000年月亮湾发掘出七八座形状各异的土坑,内存完损不等的大量器物。有的浅圆坑中放满红烧土块、碎陶器和璧、琮、瑗等玉石礼器残件;有的长方形坑中放置100多件小平底罐等较完整的陶器;有的在很浅的圆坑中部堆放各类陶器,已突出于坑口,可能是平地堆埋的。这些坑既不是墓葬,也不是窖藏,还不同于盛垃圾的灰坑。我们当时就认为它们可能与祭祀活动有关。参考近两年金沙遗址中心的祭祀区中土坑和地层中器物出土的情况,将月亮湾发现的器物坑定为祭祀坑应是可以成立的。联想到1980年以来三星堆遗址发现的众多红烧土坑、浅器物坑、灰坑的相似情况,我们认为三星堆遗址中曾出现过许多形式与等级不同的祭祀坑,它们可能就是三星堆文化时期这里经常进行祭祀活动的产物和实证。

三星堆神权国家的形成发展和影响,可能是研究古蜀文明形态特征的关键所在。如果说与生态环境协调的经济生活——稻作文明、适应自然的文化传统——神话古史是前提条件,而以原始宗教维系的古国——神权国家,则是问题的核心。由此派生出古蜀文明另两个显著特征,即注重人物造型的艺术传统、多元文化的有机融汇的社会构成,进而在神权与王权的统一和矛盾之中,影响着古蜀历史的发展,并因其人神相通的神仙观念,成为道教思想的重要源头。古蜀文明如此鲜明的形态特征,使其在统一的进程中成为汉民族根基之一,在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发展史上都有特定的历史地位。

#### 四、用人物造型来展示权威——艺术传统

三星堆尚未发现可识读的文字和可靠的历史记载。它的大量文化信息,主要是通过一批具体形象的造型艺术作品表现出来的。重视人像及动植物造型的习俗,用人物造型来展示权威,是古蜀文明又一个显著的艺术特征。

根据三星堆祭祀坑的发掘报告分类统计,一二号祭祀坑共出土具有造型艺术风格的文物六七百件。其中青铜人头像57件(包括戴金面罩的6件),大小人像20多件(有些组装在神器之上),人面具25件,兽面具9件,铜树6件,神坛神殿5件,龙、虎、鱼、鸟等动物雕像或饰件100余件,还有太阳形器6件,铃铛挂饰185件,“眼”形饰件109件。金器中有虎、鱼、杖等数十件。玉器中也有鱼形璋、鸟形璋等上百件雕塑作品。加之大量的青铜、玉石礼器,组成了一个庞大的造型艺术宝库。

最令人惊叹的是数十件大小不等的青铜雕像作品,包括立人像、人头像、人面具、铜树和鸟兽造型。古国先民们运用了圆雕、浮雕、线刻、组装等艺术手法,使之产生出强烈而生动的艺术效果。又如金杖上的鱼、鸟和人头像,线条准确,形象生动。玉边璋上的一幅“祭山图”,用极细的线条刻绘出22个人物像、16座大山,以及云层、祭器等等,具有完整的绘画构图和主题思想。

三星堆古人的信仰习俗,三星堆古国的权威,大都是用动植物或人物造型展示出来的。太阳轮、大山、神树等,可能是自然崇拜的象征物;形态多样的各类动物,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也是图腾崇拜的表现;巨大的面具和眼形饰件,表现了神灵的奇异与威严,或许就是祖先神蚕丛的神像;与真人大小相仿的人头像,既有人形态,又有神的气派,可能是一群具有通神能力的巫师和首领;而那具2.6米高的全身大铜像,其突出的装束、体量、动作和材质,表明它具有超凡的地位和作用,可能是群巫之长,用指挥祭

祀活动展示出高度权威;具有综合表现方式的铜树、神坛和“祭山图”玉边璋,更是表达了丰富的崇拜习俗,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三星堆的发现,“使人们对东方艺术重新评价”,“对中国金属制造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朵古代艺术上的奇葩,无论从技术上还是从艺术上,都有待人们去研讨。从思想内容看,这是古代蜀人“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信仰和祖先崇拜习俗的表现。关于艺术与宗教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艺术本身起源于巫,因为艺术旨在施行某种巫术来招引部落赖以维生的动物。不管这种观点是否普遍成立,至少在三星堆巫师主持的祭祀活动中,优美的艺术造型起着召唤各种神灵的作用。正像秦汉时期神仙思想促进了汉画艺术的成熟,南北朝隋唐佛教盛行使石刻造像艺术达到顶峰一样,三星堆原始宗教信仰造就了丰富灿烂的古代巴蜀造型艺术,这种善长形体塑造的艺术作风,是巴蜀古代先民自然而淳朴的精神面貌的体现,又形成了四川造型艺术发达的传统艺术风格。这一传统在汉代丰富的陶俑画像、唐宋神奇的石窟造像上得到进一步的发扬。

### 五、多元文化的有机融汇——开放与创新

三星堆文化是由多种文化成份有机汇合而成的,表现出由部落联盟发展而成的“三星堆古国”的社会结构特点。三星堆出土文物有不少形制奇特,不仅在四川首次发现,而且在全国也较为罕见。还有些器物似乎又与其他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中原、东南、西南、乃至西亚都有一定关系。有的论者以其中某一些特征为据,就推测三星堆文化来源于某个族系。我们认为,到以祭祀坑为代表的三星堆古国繁荣期,该文化至少已在本地存在发展 1000 多年,其主体为本地土著文化应是肯定的。多种文化的存在,特别是在祭祀坑器物群中汇合,反映的似乎是以部落联盟形式构成的古国的结构特点,是各地各民族部落,乃至各民族聚集到一起来形成的文化。他们带来的不同文化,汇合在一处,为三星堆文化所吸收,以实物形式存留了下来。祭祀坑中出土的大铜人和 50 多件人头像,与真人大小相似,我们认为它所表现的是参加盟会的各部落酋长首领的形象,同时也是各自的宗教首领(巫师)。大铜人全身铜铸,高踞方形祭台之上,应为“群巫之长”,也就是国王。其他铜像颈下呈三角形尖形,应是装在木质身体之上的,他们的地位低于大铜像,可能代表了各民族部落。从头像特征看,大部分与铜人像相同,头戴方帽,颈后一根长长的独辫,它们可能属于同一个主体民族集团;但也有十多件有不同的脸形,头饰发饰具有明显的民族差别,正是不同部落参加会盟的生动表现。这一时期的国家,可能主要以结盟方式和宗教信仰习俗来维系,其地域范围大约是不明确不固定的,或许尚没有形成明确的国界。这种联盟式的蜀国,主要可能是以其文化和宗教的力量来吸引远方的部落前来参加盟会。从大量海贝、象牙、金器、玉器的发现,证明广大西南山区甚至南方沿海,都在三星堆古国的交往范围之内。吸收众多的氏族部落和多种文化,正是三星堆古国的又一特点<sup>[11]</sup>。

三星堆文化与周围其它文化曾有过某些特定的关系。如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骑虎铜人像,经研究其原型可能是良渚文化中盛行的人面神像,说明两地、两个文化之间曾有过某种特殊的关系<sup>[12]</sup>;三星堆铜牌饰和陶器群的研究证明,它与河南二里头文化有过密切的关系<sup>[13]</sup>;三星堆铜器群和玉器群研究证明,它与商文化有过直接的关系<sup>[14]</sup>;有些学者认为三星堆金杖、金面具、神树等可能与西亚文明有某种的关系<sup>[15]</sup>;而三星堆出土的海贝和象牙则与西南及东南亚地区有一定关系<sup>[16]</sup>。我认为这些关系都可能存在,其具体程度和原因可能是相当复杂的,要分别做具体分析。它们至少说明影响三星堆文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能简单抓住某个因素就说三星堆文化是从哪里传来的。应当说高度发达的三星堆文化,是多元文化相互撞击与融合的结果。具体分析它与各种文化的关系,将有助于多层面、多角度地揭示三星堆文化的丰富内涵。三星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正是通过吸收汇纳多种文化才得以形成并发展繁荣起来的。

造成这种融合现象,可能有历史、地理、民族、经济、军事、政治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宗教信仰和祭祀活动形成的联系,可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三星堆古城由于经常举行宏大而神圣的宗教祭祀活动,加上它强大的经济文化实力,吸引了远近众多族群和国家前来交往,使三星堆古城成为了多种文化交汇在一起的古代文明中心。三星堆铜人像的形象、装束、大小有很多不同,可能反映了参加祭祀者来自许多不同的民族或群体,众多的动物雕像则可能是代表不同氏族部落的图腾。外来文化的加入又大大促进了三星堆古蜀文明的发展。各种文化往来的时间和情况可能有所不同,但大型宗教活动的吸引力产生的强大凝聚作用或许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三星堆古城大约已经成为了一个兴盛的宗

教祭祀中心,它以祭祀活动的形式实现了文化的融合和社会的繁荣。正是它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多元文化的撞击和融合,在吸收众多外来因素时,进行了实质性改进和创新,才创造出独具特色而又光彩夺目的古蜀文明。

## 六、神权与王权的统一和矛盾——神奇与落伍

三星堆时期古蜀文明的神权国家发展到了一个高峰,通过神权与王权的结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灿烂文明。这时的首领国王大约是以巫师和“群巫之长”的面貌出现的。从出土文物看,三星堆遗址多祭器礼器而少有兵器,即使出现有玉戈、石矛、齿援铜戈等,也只具有礼仪性质。最早的巴蜀式兵器集中出现在与中原文化交界的汉中——宝鸡地区,那里可能曾是商周时期古蜀王国的前线阵地。三星堆古城或许曾是一个基本不设防的政治经济和宗教活动中心。因此,三星堆古城在商代晚期遇到某种内部和外部力量的冲击时,缺乏必要的抵抗能力,很快便被新兴的十二桥文化所取代,古蜀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转移到了成都地区。这可能就是三星堆古国迅速神秘消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继后的十二桥文化,它的主人可能是古蜀传说中的杜宇氏蜀国。他们虽然可能划定了边界(“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等)<sup>[17]</sup>,增加了兵器,但仍是一个带有明显神权性质的国家。杜宇氏蜀王不仅是“从天坠”的,而且死后化为杜鹃,“升西山隐焉”<sup>[18]</sup>,充满神的色彩。从出土文物看,在十二桥文化中心区的金沙遗址中央,也是一大片“祭祀区”,在数米厚的地层中,发现了大量金器、玉器、铜器,成吨的象牙,数千枚獠牙和鹿角,大多是祭器礼器,包括太阳鸟金饰、玉琮、铜人像、鱼鸟纹金带等珍品,证明在数百年间这里经常进行着国家级的宗教祭祀活动。羊子山土台可能是十二桥文化时期的祭天场所,彭县竹瓦街所出的铜器群也有明显的祭祀性质。成都平原的十二桥文化类型遗址大多被水冲毁,表明这个带有神权性质的国家在自然灾害面前的无力,杜宇氏蜀国最终被善于治水的开明氏所取代。

开明氏蜀王统治的晚期巴蜀文化时期,巴蜀式兵器大量出现,分布广泛,表明这是一个尚武的国家。据说他们也曾立宗庙,设礼乐,改帝为王<sup>[19]</sup>,努力向中原诸侯国看齐,但它仍然保持了古蜀文明神权国家的很多传统与基本内核,依旧是一个神权色彩浓厚的国家。开明氏的祖先鳖灵“死,其尸溯流而上,至汶山忽复生”,曾“决玉垒山以除水患”。开明氏蜀国有移山的“五丁力士”,纳妃为武都山精,信秦王有“便金”的石牛,修石牛道以迎。迁都则要“自梦郭移”<sup>[20]</sup>。从考古发现看,晚期巴蜀文化时期盛行“船棺葬”,企望以船渡亡者到天国或祖先之处。即使是兵器之上,也大量刻铸具有祈祷咒语性质的“巴蜀符号”,力图借助神灵的力量取胜。这种“巴蜀符号”,已具有了文字的一些特征,但由于主要用于咒语或宗教活动,可能未在日常生活中发挥实际效用,没有发展成可通用的文字,在秦汉时被弃用之后,成了至今未能识读的一种死文字。春秋战国时,中原各诸侯国在争雄和百家争鸣中纷纷变法,创立了儒、法、墨等较系统的思想理论和经世学说时,蜀国仍安然停滞在神权国家的幻梦之中。虽然“其国富饶”,但体制和国力都大大落后了,加上蜀王荒淫无度,“有桀、纣之乱”<sup>[21]</sup>,巴蜀争战引狼入室等原因,最后在公元前316年被力图统一全国的秦国所灭,成为了秦“兼并天下”的后方保障和前进基地。

古蜀文明的神权国家曾经以其特有的面貌创造了灿烂的文明,留下了大量文物珍宝。但它在历史潮流中逐渐落伍,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这正是神权国家的神奇与落后之间矛盾统一的具体反映。

## 七、神仙思想的重要基础——道教之源

以神权国家为特征的古蜀国在与中原争战中失败,最终融汇于秦汉文明之中。这既是中华诸多文明数千年间不断交融的必然结果,也表现出古蜀文明的弱点和神权国家的特性。但相对独立发展了上千年的古蜀文明,不是被简单地同化或消灭了,而是作为华夏文明的有机部分,汇入了中华文明之中,并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古蜀人的许多思想观念和信仰习俗,就成为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重要源头之一。

从现有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古代蜀人崇尚自然,信奉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相信人神相通,人与动植物可以相互转化,可以通过宗教活动使人升天成仙,并创造出许多表示精灵、神怪、巫师、祖先,乃至通天的神树、天地人三界的神坛等祭器和礼器,表达出丰富完整的信仰观念和崇拜习俗。他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有一种朴素而充满生机活力的认识。秦汉时期通过文化的融合,这些思想观念不但未消失,反而以更民俗化的形式发扬光大,成为神仙思想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促进了中国道教的产生。

秦汉之前,古蜀人的这些思想曾对楚文化的发展有过较大影响,而神奇、灿烂的楚文化,被认为和齐人神仙思想一样,是道教产生的重要根基。可见蜀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独特的影响。秦汉之后,四川地区受古蜀文化传统影响,盛行长生不死、升天成仙等信仰观念,从出土大量汉画像砖、摇钱树等文物中,也可以看出一种以升入天国、极乐长生为主题的崇拜习俗。东汉后期四川兴起的“五斗米教”,正是在这些思想支配下产生的,并成为道教起源的重要基础。东汉末年张道陵在川西鹤鸣山——青城山最终创立了道教,应该说是与古蜀文明的传统思想和社会基础有着密切关系的。

## 八、统一的汉文化的根基之一——历史地位

古蜀文明在中国国家起源和发展的三部曲,即“古国—方国—帝国”的进程中,经历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发展过程,最后成为多元一统的中华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中原等地文化之间有长期的文化联系,经过 3000 余年的自身发展,在 2000 年前融合为统一的汉文化。古蜀文化绵延不断,脉络基本清楚,特征十分突出。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说:“巴蜀文化自成体系,特征不是表面的,而是内在的。”古蜀文明的形态特征,包括有原始宗教盛行、造型艺术发达、多元文化有机融合等内容,其核心部分可能是建立起具有神权性质的国家,从而创造出大量以雕塑艺术形式出现的文物珍品,形成许多朴素的信仰习俗,成为我国传统思想的源头之一。

古蜀文明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它在较封闭的四川盆地发展了早期农业,开展了蚕桑和酿酒,通过栈道、笮桥等,沟通了四面八方的文化联系。它积累了长期的治水经验,促成了都江堰的兴建,创造出“天府之国”。它在造型艺术、歌舞音乐方面多有创建,在天文、地理、冶炼、建筑等方面也颇有成就。它还在神话传说、哲学思想、文学艺术上为我们留下许多宝贵的遗产,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古蜀文化也是汉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中国狭义的“汉文化”,是从汉王刘邦在汉水上游汉中地区的兴起开始的。秦岭以南的汉中地区,先秦时代曾经是华阳国,即古蜀王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汉高祖刘邦统一全国时,也直接借重于巴蜀地区的人力和物力。从汉朝到汉族到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带有巴蜀文化的许多因素在内。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古蜀文化是统一的汉文化的根基之一。

### 〔参考文献〕

- [1]赵殿增.四川考古的世纪回顾与展望[J].考古,2004(10).
- [2][7][17][18][19][20][21][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M].巴蜀书社,《华阳国志校注》本,1984.
- [3]林向.巴蜀文化区导论[A].巴蜀考古论集[C].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 [4]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J].农业考古,1982(1).
- [5][8][11]赵殿增.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古史研究[J].四川文物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1992.
- [6]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徐中舒.论巴蜀文化[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 [9]赵殿增.三星堆文明原始宗教的构架特征[J].中华文化论坛,1998(1).
- [10]赵殿增.三星堆祭祀坑文物研究[A].三星堆与巴蜀文化[C].巴蜀书社,1993.人神交往的途径——三星堆文物研究[A].四川考古论文集[C].文物出版社,1996.
- [12]张明华.良渚兽面为虎纹的又一重要例证[N].中国文物报,1998-9-9.赵殿增.骑虎铜人像与玉琮线刻人像[J].成都文物,2004(3).
- [13]杜金鹏.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及相关问题[J].四川文物,1995(1).赵殿增.三星堆与二里头铜牌饰研究[A].殷商文明暨三星堆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 [14]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M].文物出版社,1999.
- [15]霍巍.广汉三星堆青铜文化与古代西亚文明[J].四川文物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1989.
- [16]罗开玉.三星堆遗址与古代西南文化初论[J].张善熙,陈显丹.三星堆文化的币初探[J].四川文物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1989.

(责任编辑 文清)